

倾听心灵

中国电影人
口述研究论文集

启之主编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心灵：中国电影人口述研究论文集 / 启之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
ISBN 978-7-108-05041-0

I. ①倾… II. ①启… III. ①电影评论—中国—
现代—文集 IV. ①J9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1377 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编者前言

2008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承担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国家项目。在3年的时间里采访了二百多位老电影人，此项目的第一期工程于2011年告竣。本论文集就是对这一工作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

陈墨的三篇论文，对口述历史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其《口述历史能为电影史研究贡献什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一文探讨了口述历史的种类。作者认为，口述史学“具有人民性、专业性、规范性的特征。个人主体讲述不仅是口述历史的特点，也是口述史学独立或自立的依据”。其《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一文探讨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作者指出：“这一问题有多种表象，可在心理—社会—时间的多维结构中找出不同原因，口述历史工作者须针对这些表象与原因找出相应的矫正方法或补救措施。”“口述历史的最大弱点和困难源自个人口述，而口述历史的最大优势也正在于此。口述历史不仅提供客观事实，还能提供个性化及多样化的主观信息和心理真实。”其《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一文，提出了建立口述历史/心灵考古的理论构想。作者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对话，通过受访人的回忆与陈述，重建过去专业经历、社会生活、个人心灵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口述历史工作是一项需要采访人与受访人密

切合作的心理工程。”

李镇的两篇论文既有对口述本体的探讨，又有较强的实践性。其《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一文从口述历史的“缺陷”入手，探讨了与口述历史相伴的主观性、细节性、互动性、情境性和模糊性，参考实例分析了这些属性的成因、价值和意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原则。其《与电影史对话——“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介绍了这一项目的发起、采访对象的特点以及方法。

黎煜的两篇论文，一篇谈口述历史的修辞，一篇谈口述历史的基础理论。其《从口述话语到出版文本：口述历史修辞学——结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一文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恰当使用口述历史修辞方法将口头语转换为书面语”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其《对话过去、当下、现在、未来：口述与历史》是一篇超长的文章，作者从口述与史料、口述与历史、口述与未来的历史这三个层面探讨口述的本质和特征。在“口述与史料”一节中，作者借助索绪尔的语言学，分析了“独白的史料”和“对话的史料”的差异，提出了关于口述历史的定义，即它是“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的史料”。在“口述与历史”一节中，作者多方面总结了访谈实践，分析了作为史料的口述的特点，认为口述由于具备对话“过去—现在—未来”的属性，因此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的、对话的史料。这一史料富于细节，调动想象力，使历史的深度撰写成为可能。在“口述与历史撰写”一节中，作者分析了口述与微观撰史及宏观撰史的关系，并对历史撰写中的真实性、“伪”、“误”、“虚”、“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边静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杂谈》一文，探讨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与人民史观的异同，并对口述史的方法论进行了探

索。作者认为，口述史的基础是人类的记忆，口述史是一种会话叙事，口述史方法具有广泛性和创造性。

启之的《受访者的心理》一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将受访者的心理分为“抵制心理”、“疑防心理”、“应景心理”和“迎合心理”四种。持抵制心理者常常拒绝采访，有疑防之心者对采访犹豫不决，应景心理有粉饰的倾向，迎合之心迎合的是当下的主流话语。据此，作者认为，在口述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双重文本”——每个受访者都有两个口述文本，一个是其同意公开的“显文本”，一个是他拒绝公开的“潜文本”。“潜文本”与“显文本”相加之和才是受访者口述的全部内容。

上述论文中有5篇属于口述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它们对于中国的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余4篇属于经验的总结和技巧的介绍，对于参加口述历史工作的人有一定应用价值。

本书附录的10个文件分三类：第一类是策划性的，如项目书、计划书；第二类是操作性的，如常规问题200问、集体采访总结报告、西安口述历史工作备忘录；第三类是法律性的，如保密协议、授权书、登记表。这些文件对打算从事口述历史采访的单位和个人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后两类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编者 2013年3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编者前言	/ 1
口述历史能为电影史研究贡献什么？ 陈墨	/ 1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	
心灵考古：口述历史的方法与模式探索 陈墨	/ 21
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 陈墨	/ 46
与电影史对话 李镇	/ 70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工程”	
口述历史本体属性初探 李镇	/ 84
受访者的心态 启之	/ 105
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杂谈 边静	/ 119
从口述话语到出版文本：口述历史修辞学 黎煜	/ 134
——结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	
对话过去、当下、现在、未来：口述与历史 黎煜	/ 155
附录一 抢救中国电影特殊文化遗产工程暨中国电影人 口述历史项目书	/ 210
附录二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实施细则	/ 218
附录三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常规问题 200 问	/ 223
附录四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	

	采访登记表 /	231
附录五	无限制授权协议 /	232
附录六	有限制授权协议 /	233
附录七	中国电影资料馆“口述历史”项目员工 保密协议 /	234
附录八	集体采访总结报告 /	237
附录九	西安口述历史备忘录 陈墨 /	243
附录十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二期工程计划书 /	260

口述历史能为电影史研究贡献什么？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1〕}

陈 墨

在电影频道的资助下，中国电影资料馆于2008年初展开了“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至2009年底的两年间采访了205人，录音、录像超过1185小时。我作为采访人参与了这一工作，两年间采访了47人，时长774小时。

2010年1月7日下午，中国电影资料馆和电影频道联合举行了口述历史阶段性总结汇报会。我在会上的发言标题为“我们来晚了，但还是来了，且要继续下去”，开头是感叹也是陈述，中间是汇报也是总结，最后是希望也是思索。这一工作肯定要进行下去，幸运的是我们有望继续得到电影频道的资助从而能够进行下去。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将如何继续下去？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要把口述历史工作做得更好，必须对前一阶段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借助具体的案例分析，希望能够探索到理论层面：争取对口述历史、电影口述史，尤其是中国电影人口述史的观念、原则和方法有所贡献。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研究”（批准号09BC031）阶段性成果。

一、采访调查与口述史学

在思索或讨论口述历史这一问题时，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什么是口述历史？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口述历史？

这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我们要面临的实际问题。其一，中国的口述史学开始于何时？对新中国初期即经常开展的大型社会（历史）调查、“口碑史料”的收集应如何界定？其二，现在从事口述历史调查的人很多，在口述历史同一旗号之下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工作规范形形色色且莫衷一是，如何界定与评述？

吉林大学历史系口述历史学家杨祥银先生早在10年前就曾发表过论文《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对有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如1954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大型活动；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组织的对太平天国史料的大型调查；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组织部分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调查；1958—196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展开对义和团骨干及支持者的调查；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对辛亥革命中的一个学会的历史调查；1957年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组织师生调查队进行乡土历史资料的收集调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门组织的历史资料收集活动等等。杨先生没有提及的，还有更早的1951年由中宣部组织，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江青）等13人组成的调查团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还有新时期出现的遍及全国各部委机关及所有省、市、县的“中共党史征集办公室”及其口述史料征集工作。以上种种，是否都应该归入中国口述历史？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给出回答。

实际上，电影界还有更早的例子。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

记者沙基就曾在《申报》1933年9月22日至1934年2月18日的“本埠增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采访报道了卜万苍、郑正秋、裘芑香、邵醉翁、程步高、孙瑜、费穆、张石川、李萍倩、蔡楚生、洪深、姜起凤、吴村、史东山、应云卫、陈铿然16位电影导演的生平事迹，其史料价值无可置疑。

若真的要追根究源，我们会看到中国乃至人类的口述历史活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讲述，无不是口述历史，在文字发明及使用之前，一切人类历史记忆、讲述或记录都只能是口述史。先祖黄帝，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的圣贤尧、舜、禹，都是口述历史中的人物。中国史家典范司马迁的《游侠列传》等篇的资料来源，也应该是口述历史，因为官方史料中记述那些草莽英雄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当然，西方也同样如此，《荷马史诗》就是古希腊先民口述历史的一个经典范式。

没有任何理由说上述种种并非口述历史，因为它们都符合口述历史的最基本的条件：有人口述、有人记录、内容涉及历史。问题是：黄帝及尧、舜、禹故事、《游侠列传》及沙基先生的访问算不算是“口述历史”？如果算，那它就要比公认的口述历史专业诞生的标志，即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成立，还要早15年乃至数千年。如果不算，那么上述口述历史又该如何界定呢？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解答。一是初民口述历史或古典口述历史与现代口述历史须加以区别；二是广义的口述历史与狭义的口述历史须加以区别；三是口述史料调查与口述史学须加以区别。

初民的口述历史或古典的口述历史与现代口述历史的区别是相对容易的。初民的口述历史中虽然有历史的信息，但也有神

话、想象、传奇、演绎、缺漏的成分，甄别与辨析的难度通常较大；而现代口述历史的内容中历史信息的含量及纯度显然较高，且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及甄别手段也显然要比过去丰富得多。

广义口述历史与狭义口述历史的区分应该也不太难。所谓广义的口述历史，指的是一切通过采访调查手段即口述实录形式所取得的有关历史信息，例如前面所说的沙基先生对 16 位中国电影导演所做的采访报道，也包括现在的电视台、电台、专业或非专业杂志、报纸、网络等传播媒体所开设的“口述历史”专栏或类似栏目及其作品，大都是广义的口述历史。虽然，其中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新闻或新闻背景，有些甚至不过是娱乐或娱乐背景，但其中确是包含了历史信息，所以没有理由将这些作品排除在口述历史的大门之外。因为，口述历史并非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专利。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新闻采访或节目调查中的口述形式与狭义的即专业性的口述历史工作混为一谈。毕竟，在口述历史调查中，在工作目标、工作规范等方面，都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

比较困难但又更为重要的是，把口碑史料调查与狭义口述历史加以分别。我不认为上述 20 世纪的诸多社会历史调查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理由分别是：

第一，有一些调查活动是由一些未经专业培训、专业培训的业余人员进行的，其调查取证工作也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例如“武训历史调查团”中，袁水拍、江青等人肯定算不上是专业人士，其调查工作的专业水准值得怀疑。

第二，即使有专业人士参与，但有许多调查都是出自政治目的，且在调查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调查采访目标，即为政治目的而非历史学术。例如“武训历史调查”中，武训已被判有罪，调查不过是事后取证。在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历史的调查中，也有类似情况，有关调查资料恐需经过严格的学术质疑与评估。

第三，除开非专业人士、非学术目的不说，当年的许多调查，在调查取证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工作规范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历史调查，虽说人多力量大，但却容易在法律、道德、学术、技术等方面出问题。心理暗示乃至公开动员而得的口述史料，如何能真正让人置信？

第四，最关键的一点是，过去的疑似口述历史活动被称为“社会调查”或“口碑史料调查（收集）”是有道理的，它只不过是历史（有时候甚至是政治）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立且可以自立的分支。

综上所述，我觉得应该能够得出一些结论。即社会调查仍然是社会调查，与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仍然有所不同。进一步说，若说社会调查也具有口述历史的（资料、史料）价值，那么真正的口述历史就应该有一个能够与之区分的概念，例如叫做口述史学。

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学，应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或 90 年代初期才出现的。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对 100 多位科技界的老人（70 岁及以上）的采访，贵州省社科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的张晓先生对贵州西江苗族妇女所做的口述历史采访研究，以及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陆弘石先生对王为一、何非光、汤晓丹、桑弧等十几位电影老人的采访，才算得上是真正自觉的口述历史，具有口述史学的价值。

为了把什么是口述历史或什么是口述史学这个问题说清楚，应该对此作一个界定。口述历史当然离不开口述，离不开对话，离不开历史，但并非所有关于历史的对话或口述都可以成为口述历史。谁在提问以及如何提问，谁在口述以及如何口述，如何记录以及如何呈现，是区分纪实采访、社会调查、口述历史的重要标尺。真正的口述历史，应该具有人民性、专业性、规范性等重要特征。

其一，人民性。口述历史最重要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它在历史学界最突出的革命性的贡献，即在于它的人民性。用英国口述史大家保尔·汤普生的话说，即“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人民是口述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是纪实采访或社会调查的对象。只有充分领会这一点，才能真正领会口述历史的实质。

其二，专业性。口述历史是一项专门的工作，自然要有专业性的要求及专业性的标准。它不仅要求历史学的专业性，且还要求具有口述历史或口述史学的专业性。口述史学的专业性，不仅要求采访人对采访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历史及相关知识），还要求采访人具有采访者所必须具备的采访技能、会话与交流技能、现场阅读及把握能力，必须懂得心理学以及人情世故。

其三，规范性。口述历史的采访是一种专业性田野调查工作，当然需要有必要的专业规范。用录音机、摄像机还是用电脑等并不重要，关键是与口述历史工作相关的法律、道德、伦理及工作程序规范和相关技术规范。不同的采访人或采访工作团队的工作规范或许有所不同，但一定都要有具体规范。

如此，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什么不是，应该基本清楚了。

二、口述史学的自立依据

对于口述历史，我们是后来者。晚到让我们永远失去了数不胜数的重要采访对象，如最近刚刚离世的孙道临、谢晋等大师级人物，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另一方面，后来者也有后来者的方便之处，那就是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在专业与规范方面少走弯路，使我们的工作更富成效。甚而，对于真正理解

并热爱这项工作的人，因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只要努力工作，或许还能够对口述历史工作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对口述史学做出新的贡献。

在进行口述历史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做这项工作要达到的预期目的是什么？对我，对我们的工作团队而言，口述历史的真正意义、价值、目标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细致讨论。结论是：我们要做的口述历史应该包括电影从业经历、社会经历、个人生活这样三个维度，简单说就是要在口述历史采访中探索并建立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的三维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课题名称并不是中国“电影”口述历史，而是中国“电影人”的口述历史的原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希望体现历史学者的一种专业特征，即希望具有比现实功利追求更为长久的历史视野。我们的口述历史不是、更不该是一种简单的一窝蜂的时尚工作，而应该是一种具有长远目标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是在为 50 年后或 100 年后乃至更长时间之后的历史学者积累素材，因而应该为未来的历史学研究预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有一些远见，而不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确定电影专业史、社会经历史、个人心灵史这样的三维采访计划时，我们商定，这一真正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暂时只能在团队内部实行，而不应向团队之外公开。对工作团队之外的人，我们只需说我们是在做电影专业的口述历史即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害怕不被理解。而今，我们的口述历史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为了以后的口述史学的发展，我觉得有必要将我们的工作目标及其具体要求说出来，让大家讨论或质疑。

上述所谓三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工作的三个层次目标。下面将具体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工作目标。

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目标，当然是要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积累史料。我们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收集口述史资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对此，我们不必做任何解释，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当然也还有误解，那就是误认为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要“重写中国电影史”。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中国电影史何时重写、由谁重写，我们都会认真做好口述历史工作。

之所以要把受访人的社会经历作为我们更深远的目标，原因之一，是每个人的专业工作经历都与其社会背景、社会地位、社会经历密不可分。若不了解和理解特定的社会背景及经历，我们对受访人专业工作的历史就很难作出真正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典型的例子如“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这一想法或说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艺术家的基本特征的，甚至不符合人性，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才能真正被解读。原因之二，是我们选定的采访对象，是80岁以上的老电影人。这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甚至是（我希望）空前绝后的。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镇反”、批《武训传》、“三反”、“五反”、“肃反”、批胡适、批胡风反党集团、“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反官僚主义、三年困难时期、“四清”等不止一次的整风，以及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遇到的是10年之久的战乱，而在他们中壮年时期则遇到了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及其他社会灾难事件。在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中国电影人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肯定大大低于50%。若不让他们说这些，仅仅说其业务工作，那势必会有巨大的缺漏，而且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们业务工作的特殊环境，无

法建立业绩评价标准。原因之三，是希望我们的口述历史工作，不仅可以为未来的电影史家提供丰富的口述史资料，且希望能够为未来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明史甚至经济史、城市史、风俗史、社区史、妇女史等不同专业史家提供信息资源。为此，我们讨论研究出了一套社会经历问题模式。

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维度即个人生活经历与心灵史的维度。在专业史、社会史、心灵史这三维之中，个人生活经历及其心灵史这一维度其实是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维度，只有彰显这一维度，才能将受访人真正区分开来，并充分体现或实现其参与口述历史的真正价值。对这一问题，需详加讨论。

上一节中提及口述历史的价值在其“人民性”，对此应该没有任何不同看法。问题是，人民性如何体现？如何操作？唯一的途径或方法，就是落实到个体，并进一步落实到个体的生活经历及其心路历程上。否则，人民性就很容易成为空谈。因为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容易被无名化。

前述大多数社会调查，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性的体现，因为人民并没有成为调查活动的主体，而只是一个调查对象即咨询对象，只是提供无名的群众记忆。他们并非受邀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受邀讲述他人的故事，甚至是英雄或反英雄（如太平天国的领袖、义和团领袖、武训等）的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社会调查并不是真正的口述历史的原因。这也就是说，真正的口述历史，应该是以个体性特征体现其人民性的。进一步说，真正的口述历史应该确立人本位，要让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心路历程成为口述历史的重要维度。

如此，我们就开始接近有关口述历史讨论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口述史学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在历史学领域中独立或自立起来？答案应该就是：口述历史关注人民/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心路历程及其心灵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它独立存在